

◀ (上接2版)

以及外语、高等数学、政治课程。在学生们的要求下,吴定良接受意见,撤掉了植物生理学和微生物学,毕竟这两门课与人类学的距离有点远。后三年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前者以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为重点。为了扩宽专业视野,吴定良有意识地增加了一些生物系没有的课程,如刘树威教授讲地质学,刘威教授讲猿猴志和民族志,还聘请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先生担任兼职教授,讲考古学。

从创立人类学专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旦一直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唯一培养体质人类学的人才摇篮。“文革”前,吴定良潜心科学研究,并将研究发现应用于工业生产和国防建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鉴定方志敏烈士遗骸。在南昌英勇就义后,方志敏的遗骸与许多烈士的遗骸混杂在一起,难以鉴别。吴定良在1956年接到任务,他仔细研究了方志敏生前和别人的合影,找到当时健在的合影者测量身高,然后根据照片上两人的比例,推算方志敏的身高。接下来就是根据各种回归公式,掌握了大腿骨、小腿骨等长骨的长度数据,从混杂的遗骸中挑出了符合标准的骨头,最后拼接在一起,关节也都吻合。如果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这一任务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顺利完成。

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吴定良不仅采用弦矢指数的方法研究北京猿人的眉间凸度,以确定北京猿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还对南京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的骨骼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上海新石器时代闵行马桥人和青浦崧泽人遗骸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除了骨骼测量学,吴定良在活体测量学上也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绩,比如早期对华北人群的人体测量学调查报告,以及被称为人种学与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开山之作的论文《贵州坝苗和华南其他居民的体质》。来到复旦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活体测量学的文章。《新生儿色素斑的研究形态》一文是从形态学和组织学上探讨上海市新生儿的色素斑,将其与世界各种族的资料加以比较,并阐明了这项研究在人种学和遗传学上的意义。《近二十年来丹阳县城市儿童体质发育的增进》与《近二十年来南京市儿童体质发育的增进》通过对两地儿童体质



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系成立仪式合影

的跟踪和研究,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普遍好转。

通过吴定良的努力,体质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不断地被社会认可。上世纪50年代,他为解放军防化部队举办人体测量培训班,为防毒面具的设计作技术指导;他带领学生一起参与测量上海各钢铁厂炼钢工人的体型,为设计钢铁工人的劳动防护服收集体质信息,重新设计脚部测量工具并去不同类型的工厂收集工人脚型的数据,为上世纪60年代全国性脚型测量和鞋楦标准、鞋型尺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身为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平时也非常重视文化在人类学研究的作用,这是受到他的朋友、民族学家陶云逵的影响。据周国兴回忆,“吴师告诉我,陶云逵先生曾向他表示,他本人虽然学过体质人类学,但以后兴趣改变,转向了民族学。愿意将以前所收集的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材料,赠送给他,因为探索我国民族的起源和演化问题,从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进行至为重要,现在他们各占一方,经过若干年的研究后,殊途同归,问题定能获得很好的解决。”走上工作岗位后,周国兴写过一本《崛起的文明,人类起源的文化透视》,正是从体质和文化两个维度来展示人类的起源与发展。多维视角、交叉研究,后来就成为复旦人类学的学术方向和优势所在。

十年“文革”,复旦人类学专业经历了一场浩劫。吴定良、董悌忱、赵一清等学者相继去世,刘威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主持复旦人类学教研室工作的有邵象清、吴融西、夏元敏、王桂伦等人,薪火相传,他们像吴定良、刘威一样,坚守着人类学事业。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复旦人类学师资不足的

问题越来越严重,人类学专业的招生被迫中止。

1993年,在吴定良诞辰百年的纪念活动上,谈家桢写下了“为祖国人类学奋斗终身”。在这位科学家心里,始终有件事牵挂着,那便是复旦的人类学。1994年冬天,谈家桢亲自赴美,邀请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金力复兴母校的人类学。1997年,金力回国,在复旦建立了人类群体遗传学实验室(后获批准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始分子人类学研究,后来又联合遗传学、体质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一些专家,成立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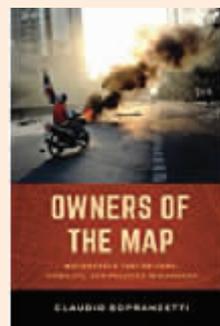
“谈家桢先生曾经说过,复旦大学的问题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说我们缺天地人心,也就是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天文地理我们做不了,至少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做。”金力在作《把基因分析引进人类学》的人类学学者访谈录时谈了自己对于人类学的认识:“在‘文革’结束后,社会人类学基本上是一个禁区,但人类学本身太重要了,因为它是一门很广泛的学问,是研究人本身,这里面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东西:社会结构、人的行为,包括我们用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有差别,人群是怎么迁移,怎么起源。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去思考的东西……现在的中国社会呢,目标就是使中国从一个比较初始形态的社会过渡到一个成熟的社会,而人类学呢,不管是社会人类学也好,体质人类学也好,可以使更多、更好地了解自己。这样的学问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是非常需要的。”

过去20年,在金力的主持下,复旦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包括证明东亚人群非洲起源、汉族形成于人口扩张、东亚现代人由南到北的史前迁徙、汉藏同源、新疆人群东西方混合、出生缺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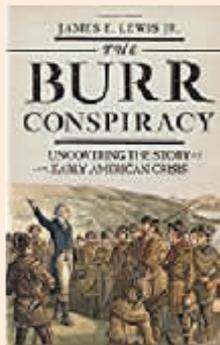
若干遗传机理等,在国内外的同行间赢得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对分子人类学研究是定位做大框架,做史前史,这是我们的目标。遗传学的作用,在研究史前史中,分辨率可能是最好的。而这一块,遗传学可以发挥作用,正好是人文科学很难研究的部分。”金力坦陈,大的框架提出来以后曾引起不少争议,无论是非洲起源说还是南部进入说,和当时的传统思维格格不入。“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都是北人南迁,而我们一开始就提出是南人北迁。我们讲得很明白,这两个是不同年代发生的事情,先是南人北迁,后来再是北人南迁。”他说,搞自然科学的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想法被一个假说套住,证明它是一种进步,否定它也是一种进步,哪怕这个结论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

复旦目前除了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新建的人类学系,还有一个人类学研究机构叫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挂在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注:该学院建有人类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所长是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纳日碧力戈。“在我们国家,一说人类学首先想到的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而文科领域的人类学,复旦这些年也有,但我们学校最出名的是体质人类学。过去有吴定良和刘威先生,现在是金力和李辉老师他们在负责。组建人类学系对于复旦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是一次比较大的推动。”纳日碧力戈的观点是,现在的复旦具备了从事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和实力,从语言、考古、文化到体质,四个分支一应俱全,“希望这个系成立后,能够把校内的资源整合起来,做到不浪费。然后打造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学,而非一枝独秀的单一人类学。”他同时补充道,借助这次建系的契机,大家也可以去反思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是否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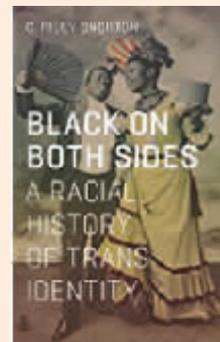
《高等教育纪事报》 新书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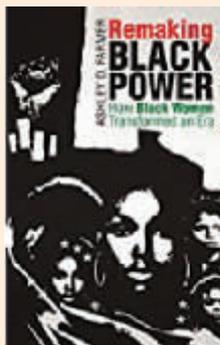
《地图的拥有者:曼谷的摩的司机、流动性和政治》(Claudio Soprzanetti 著,加州大学出版社)对曼谷摩的司机的一项民族志研究,写作背景是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泰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伯尔阴谋:早期美国的一次危机》(James E. Lewis Jr. 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依据信件、日记、报刊文章和其他有关资料,揭示曾任美国副总统的阿伦·伯尔(Aaron Burr)的往事。



《双面黑:跨身份的种族历史》(C. Riley Snorton 著,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探索自19世纪中叶以来黑人和跨性别者身份的相互作用。



《重塑黑人权力:黑人妇女如何改变时代》(Ashley D. Farmer 著,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有关黑人妇女对黑人群体力量的贡献,以及如何构造了自身新形象的研究。